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刘云若卷

春风回梦记

刘云若◎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劉雲若卷
小說典藏文庫·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刘云若卷

春风回梦记

刘云若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电话：010-66172727
邮编：1000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风回梦记 / 刘云若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刘云若卷)

ISBN 978-7-5034-8439-1

I. ①春…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4892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点 校: 袁 元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0.25 字数: 22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直面人性的“小说大宗师”——刘云若

(代序)

张元卿

1950年刘云若去世后，作家招司发文悼念，竟招来一些非议，认为不必为刘云若这样一位旧文人树碑立传。半个多世纪后，刘云若已“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了经典作家。现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即将规模推出《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刘云若卷》，这说明刘云若这个“旧文人”的小说还是有价值的，至少可以提供更多的原始文本，读者可以从量到质做出自己的评价。

关于刘云若的生平资料，百度上已有一些，关注刘云若的读者多已熟悉，此处不再赘述。本文着重写我为什么认为刘云若是直面人性的“小说大宗师”。

20世纪40年代，上官笨在《小说的内容形式问题》中写道：“我虽然是不大赞成写章回小说的人，可是对于刘云若先生的天才和修养也着实敬佩。”郑振铎认为刘云若的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这里所说的“天才”和“造诣”，指的应是作为“小说大宗师”的“天才”与“造诣”。

刘云若的小说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风行沽上了，但那也只是

“风行沽上”，影响还有限。1937年平津沦陷后，张恨水南下，刘云若困守天津，京津一带出现“水流云在”的局面，北京的一些报刊便盯住了刘云若，后来东北的报刊也向他“招手”，于是刘云若便成了北方沦陷区炙手可热的小说家，影响开始扩展到平津以外的地区，盗用其名的伪作也随之出现，而他竟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从通俗小说家变成了“小说大宗师”。

1937年9月，《歌舞江山》开始在天津《民鸣》月刊（后改名《民治》月刊）连载，至1939年5月连载至第十七回，同月由天津书局出版了单行本，这是天津沦陷后刘云若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此后，因沦陷而停载的小说《旧巷斜阳》《情海归帆》开始在《新天津画报》连载，卖文为生的生活得以继续。沦陷期间，他在天津连载的小说还有《画梁归燕记》（连载于《妇女新都会画报》）、《酒眼灯唇录》《燕子人家》（连载于《庸报》）、《海誓山盟》（连载于《天津商报画刊》）、《粉黛江湖》（连载于《新天津画报》）等。在天津连载小说的同时，北京的报刊也在连载刘云若的小说，先后连载的小说有《金缕残歌》（连载于《戏剧周刊》）、《江湖红豆记》（连载于《戏剧报》）、《冰弦弹月记》（连载于《新民报半月刊》）、《湖海香盟》（连载于《新北京报》）、《云霞出海记》《紫陌红尘》（连载于《369画报》）、《翠袖黄衫》《鼙鼓霓裳》（连载于《新民报》）、《银汉红墙》（连载于《立言画刊》）、《婉嫔英雄》（连载于《新光》）等。从数量上看，在北京连载的小说超过了天津。张恨水离开北京后的空白是被刘云若补上了，因此读者才有“水流云在”之感。在沦陷时期，刘云若在东北的影响逐渐扩大，沈阳、长春的出版社开始大量出版刘云若的小说，东北的报刊也开始集中刊载刘云若的小说，《麒麟》杂志就先后连载了刘云若的《回风舞柳记》和《落花门巷》。与此同时，随着1941年刘汇臣在上海成立励力出

版社分社，刘云若的小说开始成系列地进入上海市场，在抗战结束前先后出版了《换巢鸾凤》《红杏出墙记》《碧海青天》《春风回梦记》《云霞出海记》《海誓山盟》等小说。由此可见，沦陷时期刘云若小说的影响范围远超从前，几乎覆盖了整个东部沦陷区。这说明当时的读者是非常认可他的小说的。

那么，当时的读者为何认可他的小说呢？刘云若的小说素以人物生动、情节诡奇著称，沦陷之后的小说也延续了这种特色，但刘云若令读者佩服之处实在于每部小说程式类似，情节人物却不雷同，因而能一直吊着读者的胃口。情节人物的歧异处理虽然可增加这种类型化小说的阅读趣味，但立意毕竟难有突破，因而多数小说也还是停留在供人消遣的层面。如《歌舞江山》主要写督军“吕启龙”和他的姨太太们的种种事迹，书中写道：帅府“简直是一座专演喜剧和武剧的双层舞台，前面是一群政客官僚、武夫嬖幸，在钩心斗角争夺权利，后面是一班娇妾宠姬，各自妒宠负恃，争妍乞怜。外面赳赳桓桓之士，时常仿效内庭妾妇之道，在宦海中固位保身；里面莺莺燕燕之侍，也时常学着外间的政治手腕，来在房帷间纵横捭阖”。此书之奇在于写出了“帅府”的黑幕空间，讽刺意味自然亦有，但除此之外，读者欣赏的还是情节人物之新颖。再如《妮娜英雄》，小说写汪剑平从南京回天津，从公司分部调回总部，并准备与未婚妻举行婚礼。回到天津后，未访到未婚妻棠君，却意外地在舞场看到她同一贵公子在一起。回到旅馆后，才看到未婚妻留言，说要解除婚约。后汪结识暗娼姚有华，适公司要开宴会，汪便请姚扮作他的太太参加宴会。汪这样做是因为公司老板不喜欢未婚男士，这样一来就可以使老板认为自己结婚，不会因未婚而丢了工作。此后，汪经朋友张慰苍介绍同苑女士结婚。姚有华自参加宴会后，力图上进，恰见汪陷入命案，便思营救。她住到接近歹人的地方，想

办法救汪，慢慢发现汪的朋友张慰苍夫妇竟是匪党，而与其一伙的文则予就是陷害汪的人。就在此时，张氏夫妇设计灌醉有华，文则予趁机将有华侮辱。后有华被卖作暗娼，又利用文则予对自己的感情逃出。在路过警察局时，有华大喊捉贼，文被捉进警局，供出自己就是谋害汪的罪犯。至此，真相大白，汪出狱，有华却不再准备嫁人。苑女士在汪入狱后生活贫苦，继续做起舞女，却被一客人侮辱，受其摆弄，不得与汪重圆旧梦。有华看到汪和苑女士这种景况，又请人撮合，欲挽回他们的夫妻情缘。小说结尾写有华“宛如一个‘杀身成仁’的英雄，情场中有这样伟大的心胸，而且出于一个风尘中的弱女子，称她为‘妮娜英雄’，谁曰不宜？”至于剑平出狱后，理宜对有华感恩入骨，能否善处知己，报答深情，以及苑娼能否摆脱季尔康的羁绊，和剑平重偕白首，只可让读者们细细咀嚼，作为本书未尽的余波了”。小说命意如此，读者亦甘愿在此多角情爱中享受“过山车”般之沉醉。不可否认沦陷时期的读者需要这种“过山车”般的沉醉，而刘云若的小说最能满足他们的这种阅读需求，因此风行一时，也毫不奇怪。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刘云若在写作这类小说时竟能写出《旧巷斜阳》这样引起社会轰动的小説。

《旧巷斜阳》主要写下层贫苦妇女谢璞玉人海浮沉的故事。璞玉的丈夫是个瞎眼残废，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生活，她只好去餐馆做女招待。其间，偶遇王小二，一见倾情，几欲以身相许，但她苦于已为人妇、人母，痛苦地徘徊在丈夫和情人间，“几把芳心碾碎，柔肠转断”。此后，丈夫发现她的隐情，为成全她和王小二，独自出走。王小二为此深怀自责，忍痛南下。璞玉此时贫苦无依，只好移往贫民窟。在失身地痞过铁后，被卖作暗娼，又为张月坡侮辱，几番沉沦。后经搭救才跳出火坑。其时，王小二回津做官，两人再度相逢，经柳塘说项，遂成眷属。可惜不久督军下台，王小二身受

牵连，亡命天涯。璞玉只好依附老名士柳塘过活。柳塘晚年因发现妻子与人私通，而更加厌恶尘世生活，遂南下寻见王小二，相携出家。柳塘老宅日渐荒芜，璞玉和柳塘夫人相依为命、孤苦度日。在刘云若的小说中，《旧巷斜阳》的情节并不算太繁复，论奇诡还比不上《妮娜英雄》，但在刻画人物上，特别是对璞玉的刻画却极为成功，在连载期间《新天津画报》头版头条就常刊发评说璞玉命运的文章，最后竟转化为探讨妇女命运的大讨论，以至于1940年8月天津文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在“作者自序”和正文之间加印了“《旧巷斜阳》引起的批评讨论文字选录”，这在现代通俗小说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加印的讨论文章共九篇，分别是榕孙的《谈谢璞玉》、彝曾的《再谈谢璞玉》、榕孙的《答彝曾先生——代王小二呼冤 替谢璞玉叫屈》、趾的《与云若表同情——璞玉所遭愈苦 愈足以警惕人心》、葛暗的《关于璞玉问题的平议》、摩公的《云若的公敌 为璞玉请命》、丁太玄的《响应宗兄丁二羊》、聊止的《关于璞玉获救的感想》、一迷的《关心妇女生活者应大批营救璞玉》。

这九篇文章大都发表于连载《旧巷斜阳》的《新天津画报》，大致能反映当时读者的看法。榕孙《谈谢璞玉》写道：“谢出身微贱，居然出污泥而不染，能不为利欲所动，洵不失为女侍中典型人物。……深盼刘君能兜转笔锋，俾谢氏母子得早日出诸水火，则璞玉固未必知感，而一般替他人担忧之读者实感盛情也。”这说明璞玉在小说中的处境引起了读者的怜悯，他们不忍见“出污泥而不染”之人继续遭罪。而彝曾《再谈谢璞玉》表达的是另一派读者的意见：“日前榕孙君《谈谢璞玉》一文，请作者鉴佳人之惨劫，怜稚子之无辜，早转笔锋，登之衽席，实为蔼然仁者之言，先获我心，倾慕曷已。不佞所不敢请者，因璞玉以一念之差，叛夫背子，再蹈前辙，沉溺尤深，作者非必欲置之于万劫不复之地。但揆诸人情天理，设

不严惩罚，何以对其怙然舍家之盲目夫婿，更何以点出一班将步璞玉后尘之芸芸众生。是则璞玉之遭垢，有为人情所必至，而天道所欲昭者矣！”显然这派读者觉得璞玉“叛夫背子”应受严惩。趾《与云若表同情——璞玉所遭愈苦 愈足以警惕人心》和《再谈谢璞玉》观点相近，他觉得虽然“在报上发表文字，一再向云若警告，或请求设法把璞玉救了出来”，但作者不必就将璞玉救出，他的理由是：“但鄙人看来，现社会中像她这样堕落的女子，不知凡几。虽然堕落的途径不同，其原因无非误解自由，妄谈交际，以致身隐危境，无法摆脱，遂演出背叛尊亲，脱弃家庭，夫妇离异，以及淫奔私会奸杀拐卖种种不幸的惨剧。她们所受的痛苦，往往比璞玉还要来得厉害。所以著者正好拿假设的璞玉来做牺牲品，把她形容得愈苦，愈足以警惕人心，使那些醉心文明、误解自由、意志薄弱的青年女子，以璞玉做一前车之鉴，以收惩一警百之效，其有功于世道人心。正风移俗，自非浅鲜。”一迷的文章更是直接喊出了“应大批营救璞玉”的呼声：“我们知道《旧巷斜阳》里所描写的低级娼寮，是真有那个去处。在娼寮里受着非人生活的女人，其痛苦情形或许十倍于作者之所描写，但是无人想到她们，只知关心璞玉，这是多么不合理。”又说：“这里我们应该谈到文学了。譬如一则新闻，记载璞玉的故事，便不会如《旧巷斜阳》所写可以感人。假若关心妇女生活的当局（如新民妇女会）由璞玉想到那些在地狱里受罪的女子，而设法大批营救，则《旧巷斜阳》不是一部泛泛的小说了。”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关注，逐渐转到营救当时像璞玉“在地狱里受罪的女子”，一部小说能有这样的社会影响，首先说明它触及了当时黑暗的现实，起到了为时代立言、代无告之人控诉的作用。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的作品，在号称文学为人生的新文学作品中也很少见，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旧时代的通俗小说作家，且在日伪高

压政策的钳制下，能够写出如此惨烈之书，引发出如此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们今天怎能用一个‘鸳鸯蝴蝶派’的概念去解释他”。我想刘云若之高明，就在于能活用社会言情小说程式，他可以依照程式写很“鸳鸯蝴蝶”的通俗小说，也能利用程式写出超越“鸳鸯蝴蝶”味的小说人物，最终用经典的人物形象超越了程式，也就脱“俗”入“雅”了。当时有评论者认为“刘云若可称得起中国南北唯一小说大宗师”，这显然没有把他当作鸳鸯蝴蝶派，而直接说是“小说大宗师”。刘云若是否称得起是“小说大宗师”，暂且不论，但这称号是在《旧巷斜阳》发表之后，而且是针对这部小说而提出的，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当时读者眼中，能写出《旧巷斜阳》就称得起是“小说大宗师”。

那《旧巷斜阳》何以能体现出“小说大宗师”的功力呢？

《关心妇女生活者应大批营救璞玉》发表于1940年3月16日的《新天津画报》。此后，《新天津画报》又陆续发表了一批评论《旧巷斜阳》的文章，读者的讨论一直持续至年末。8月22日，作家夏冰在《读〈旧巷斜阳〉有感》中坦言《旧巷斜阳》是现在最受欢迎的小说。8月23日，报人魏病侠在《读〈旧巷斜阳〉之后》中认为刘云若小说之所以能特受欢迎，除了“设想用笔”等处外，还有两点：“一、其所描写者，均为现代人物，以及现代社会上各方面之事态；二、其所叙述各社会上之情事，每多其亲身经历，或随时留心调查之所得。有此两种原因，自能使读者均感其亲切有味，与寻常小说家言，大相径庭矣。”“设想”，主要指情节，璞玉落水的情节自然是精心营造的，但璞玉被救之后的情节却并不出彩，柳塘和王小二一起出家的结局也很老套，因此魏病侠没有多谈“设想”。至于“用笔”，白羽和周骥良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白羽认为刘云若“写情沁人心脾，状物各具面目”。周骥良认为：“刘云若笔下的那些被侮

辱与被损害的女性，个个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单是一部《旧巷斜阳》，揭露那些被欺压的女性挣扎在毁灭的深渊中，就足以和影响颇大的日本电影《望乡》相提并论。读作品读的是作家的文字功夫，有如看戏看的是演员演技，看球赛看的是球员球技。刘云若的文字流畅如行云流水，读起来既自然又舒服，不掺半点儿洋味，有中国传统文字之美。”他们二位的评论相隔近六十年，这说明刘云若的“用笔”不仅被时人称颂，也为后人所赞赏。以《旧巷斜阳》为例，我以为刘云若描写胡同环境和璞玉心理的“用笔”确实具有“小说大宗师”的功力。

魏病侠认为刘云若受欢迎的地方是所描写者为“现代人物”，所叙故事“每多其亲身经历”，这其实是强调作品的写实性。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写实，《玉梨魂》《北里婴儿》能引起读者关注，也是因为所写是“现代人物”，故事“每多其亲身经历”，而后来之逐渐式微，关键不在章回体的束缚，而在作家背离了写实的原则，人物无现实依据，故事少真情投入，一味以情节和色欲迎合读者。说刘云若是鸳鸯蝴蝶派，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要说明他继承的是早期鸳鸯蝴蝶派的衣钵。而称他为“小说大宗师”，超越鸳鸯蝴蝶派，则是因为刘云若的写实虽继承了《北里婴儿》《倡门红泪》的传统，却不局限于展示“北里”、“倡门”中的不幸，而是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描摹不幸人生的种种人情世态，不仅让读者吃惊，有时也能令读者发笑。平凡人生因此而变得立体可感，成为蕴蓄时代情绪的历史画面，小说因此有了史诗的意味。人情世态的核心是人性，能让平凡人生立体可感，关键在于能否写活平凡人生的人性。夏冰在《情海归帆·序》中写道：“盖云若之笔，善能曲尽事情，尤详于市井鄙俚之事，如禹鼎燃犀，无微不至。”所谓“曲尽事情”、“无微不至”，其实就是表彰刘云若能让平凡人生立体

可感。张聊止称刘云若为中国的莫泊桑，也是在表彰刘云若能让平凡人生立体可感。姚灵犀认为刘云若“应与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相颉颃”，还是表彰刘云若能让平凡人生立体可感。这些评论者都没能明确地从刻画人性的角度来肯定刘云若，而真正认识到刘云若人性书写价值的还是当代的一些研究者。

毛敏在《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家刘云若论》中写道：

刘云若遵循艺术美丑皆露的原则，对人性的复杂性做了深刻的挖掘，他十分注意人物恶极偶善的可信性，以及本性难移的必然性，力图展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他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又是不遗余力的，《旧巷斜阳》中大杂院里刘三家妓女出身、后来做了官姨太太的外甥女雅琴来探亲时，各家各户像迎接贵宾那样恭候她的到来，那种奴颜婢膝的神态将其劣根性展现无遗。刘云若批判穷人只羡慕富人，对同类穷人没有同情，譬如车夫，“一个人穷到拉车，也就够苦了……做车夫的应该可以同病相怜了，然而不然，个中强凌弱，众暴寡，以及拉包车的欺侮拉散车的，拉新车的鄙视拉旧车的，能巴结上巡警的，就狐假虎威，欺压同行，能拉上阔座的，就趾高气扬，鄙夷同伙，诸如此类，直成风气。我们看着以为一个人穷到拉车，也就够苦了，竟还有这等现象，实在可鄙可怜！然而这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啊”。这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对二十年代鲁迅小说改造国民性主题的继续，并且把鲁迅小说的题材从农民扩展到市民，不过刘云若不同于鲁迅以启蒙精神战士的姿态来审视他笔下的对象，他没有过启蒙者的经历，他是以与对象同一的眼光来体察他笔下的对象，在批判他

们的精神病态的同时，又充满了默默的温情，从而表现出不同于鲁迅小说的深沉冷峻的另一种温婉幽默的风格。他将触角伸向繁华大都市中为人所遗忘、平日蜷缩在肮脏灰暗角落中的贫苦市民，挖掘褴褛衣衫下熠熠生辉的人性。

《旧巷斜阳》中底层妇女谢璞玉因生活的逼迫而沦入娼门，出卖肉体 and 灵魂，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同样生活悲苦，却因一笔小小的意外之财而得以第一次嫖妓的人力车夫丁二羊对她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刘云若用洗练生动的文笔勾画出了丁二羊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苦生活境况，衬托出他第一次嫖妓的机会得之不易。谢璞玉因难以忍受他的污浊不堪而对他婉言相拒，丁花了“巨资”而未完成心愿不但没有恼怒反而对谢流露出极大的同情。他说道：

“可怜，可怜！我原先只道世上最可怜的，数我们车夫了，为奔两顿饭，不管冬天夏天，都得舍命地跑。热天跑得火气攻心，一个跟头栽倒，就算小命玩儿完；冷天呢，没座儿的时候，在街上能冻成银鱼，有了座儿，拉起一跑，又暖和过了头，通身大汗直流，到地方一歇立刻衣服都成了冰片，冰得难受，还须上僻静地，把冰片挫下来，你想这是什么罪过儿？可是若有两天进项不错，就可以歇天工，玩玩乐乐谁也不能管，你们……”

生活的悲苦令人发指，令人忍不住要控诉社会的不公，可下层娼妓的生活比车夫更苦，自身生活都难以确保的丁二羊费尽心思要把璞玉从火坑里拯救出来，虽然璞玉因此掉入更深的火坑。刘云若在这里深刻地写出了劳动者对妓女的同情，表现了底层人民内心的美好品质以及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揭示出人性的美好的一面。既批判又认同于

小市民，这包含着他对小民百姓卑微和平庸生活的深深理解和同情，也是对人生的正视，正视人生的凡俗性质。

我认为刘云若能用小说“挖掘褴褛衣衫下熠熠生辉的人性”，就足以说明他已具有“小说大宗师”的功力，而他“挖掘褴褛衣衫下熠熠生辉的人性”时所呈现出的“温婉幽默的风格”，就是“小说大宗师”的气派。

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刘云若《红杏出墙记》的通俗性和现代性都做了分析，认为它对人性的表现，“也是超乎以往任何一部通俗小说（包括张恨水）的”。这还是在通俗小说范围评论刘云若，但这部论著至少注意到刘云若很早就开始写人性了。可是刘云若写人性的变化，这部论著没能指出。《红杏出墙记》写人性基本是在“揖让情场”上做文章，立意还不深刻，人性刻画还从属于情节，而不是写作的中心，因此也只是“超乎以往任何一部通俗小说”，还不足以与新文学阵营的小说一较高下。可《旧巷斜阳》一出，它前半部写璞玉，已是情节从属于人物，人性刻画已是写作中心，褴褛衣衫下的人性被刻画得熠熠生辉，其价值早已经超过了以消遣为主旨的通俗小说，而具备了严肃小说的艺术特征，足可与新文学名作一较高下了。刘云若能在沦陷时期写出《旧巷斜阳》，自然得力于他长期关注人性问题，但家园沦陷的现实刺激无疑加深了他对人性的思考。而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让他的“用笔”于温婉幽默中更加平静质朴，这便贴近了莫泊桑的风格。因此，家园沦陷的现实无疑是促使刘云若从通俗小说家转化为“小说大宗师”的历史契机。

尽管沦陷时期刘云若的小说整体上还属于通俗小说，卖文为生的生活不允许他只做“小说大宗师”，但他在写作《旧巷斜阳》时

所积累的艺术感受并不曾因此而泯灭。抗战胜利后，刘云若写出了又一部能代表其“小说大宗师”水准的小说《粉墨筝琶》。孙玉芳认为刘云若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群像，“其中以女招待璞玉（《旧巷斜阳》）和伶人陆风云这一形象（《粉墨筝琶》）最为复杂生动。抗争与妥协，自尊与虚荣，生命的悲哀与人性的弱点，全都彰显无遗”。陆风云的形象塑造之所以复杂生动，除了伶人这一角色赋予的特定内涵外，也得益于璞玉这一角色提供的营养。作为伶人，陆风云自有多情妩媚的一面，但作为普通人，她又有软弱犹豫、随波逐流的一面。刘云若写陆风云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时，就借鉴了璞玉身上软弱犹豫、随波逐流的特征。但作为在江湖上闯荡的伶人，陆风云在多情妩媚和软弱犹豫之外，还有刚烈正直的一面。《粉墨筝琶》中出城一节，就显示了陆风云作为乱世佳人刚烈正直一面。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然而势终不能变其性，才见人性之光辉。陆风云处乱世而不失刚烈正直之性，正是刘云若在沦陷时期就用心刻画“熠熠生辉的人性”的延续与升华。璞玉是顺势而不失其良知，风云是逆势而卓显其刚烈，均能势变而不失其性，可谓乱世两佳人。佳人不朽，云若亦不朽。

刘云若在《粉墨筝琶·作者赘语》中写道：“作小说的应该领导青年，指示人生的正鹄，我很想努力为之，但恐在这方面成就不能很大，我或者能给人们竖一只木牌，写着‘前有虎阱，行人止步’，但我也不愿作陈腐的劝惩，至多有些深刻的鉴戒。……至于我爱写下等社会，就因为下等社会的人，人性较多，未被虚伪湮没。天津《民国日报》主笔张柱石先生说我善于写不解情的人的情，这是我承认的，因为不解情的人的情，才是真情，不够人物的人，才

是真人。”幸而刘云若没有积极的“领导青年”的意识，也“不愿作陈腐的劝惩”，才使得他既不同于新文学作家，也不同于通俗小说家，对雅俗均能保持清醒的距离，内心却别有期许：“比肩曹（雪芹）施（耐庵），而与狄（查尔斯·狄更斯）华（华盛顿·欧文）共争短长。”

天津作家招司和石英都曾用“淋漓尽致”来称赞刘云若刻画人物的功夫，不知他们在称赞之时，是否意识到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一位混迹于市井的“小说大宗师”？如今，读者面对刘云若的这些小说作品，是否会觉得“小说大宗师”迎面而来呢？

一切交给读者，交给历史，我想刘云若有这样的自信。

2016年10月19日晚于南秀村

自序

余近日百凡无状，遇事即生悲观，无意中以悲意行文，竟得此满纸凄黯之文字，良非始料所及。天下之作小说者，仅呕心血，余则于执笔时尚大动感情，狂挥痛泪，故必择无人处为之，恐人惊痴痴也。一篇竣事，五内摧伤。古人著书感人，吾乃自感，真大蠢事。倘作此等书数部，吾寿其将不永乎！

至于内容或有疵谬，然日累俗冗，夜亲笔墨，成此急就之章，十字街头之作品，固难比于象牙塔中所出，知者当能谅解。

书中不愿有头巾气、书卷气，而江湖气不能免，脂粉气亦多，是则为笔势所趋，不可撓逆者也。至吾原意，固以诗气行于小说，倘读者读此小说如读一张诗，则作者所愿毕矣。

如人谓此书为写情专集，吾不敢辩；若谓专写男女私情，却不敢承。盖仅就情字放大之，至于弥天际地。读者见有男女，作者下笔时，固未知有男女也。人或怪书中至性人太多，非今世所能有。曰：“然！”作者虽居闹市，如处荒墟，求人且不易，况于至性之人！故造作藏于书中，以供晤对。

全书皆求近人情，故书中人无极善极恶，以世间人中和者多，难得极善极恶也。又无完人，以世间本无完人也。如所写惊寰之时明时黯，怜宝之时愚时狡，周七之既勇而偏，若愚之似聪实蠢，皆